

阶级与生存体系

董天佳

人是社会的主体,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在阶级社会的诸多社会关系中,代表着生产力、生产关系的阶级关系又是基本的,所以,“人”的基本内涵是阶级,生物的人与社会客体的结合点也是阶级。所以,阶级分析方法是阶级社会里认识人、也是认识社会的基本方法。我同意这一看法,但我们不能停留在理论上对阶级进行抽象,只讲固有的阶级本性,阶级就会被抽象成阶级本性的空洞骨架,在实际社会中是找不到这样的人、这样的阶级的,也就无法明了阶级组成的社会。特别是当我们从事现代化建设,需要对特定社会进行具体认识的时候,反映实际作用于社会的活生生的阶级,而不是抽象的、潜在的阶级尤为重要。

利益决定行为,各阶级的行为受自身利益的规定。我们一般只讲阶级的根本利益,即争取生产资料的占有权、争取社会经济关系中的支配地位、争取社会财富的占有。然而,阶级的根本利益外化成社会行为作用于社会时却受着许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生物规律并不因人的社会存在而取消,只是起作用的条件变了,以人所特有的方式表现出来;作用于人类生物规律的社会条件的复杂性决定了这种需求的复杂性,除生产力、生产关系之外,人的需求与社会存在的结合还有多种形式,这些虽然脱离不了一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水平,但在这既定的水平上却可以有多种发展方式,各种因素作用的程度不同,大小各异,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不同条件下某一方面会突出出来,成为人们行动的主要动因。许多时候人们实际上认识不到自己根本利益之所在,注意力集中在生活中的直接因素上,陷于具体占有之中,阶级的利益是从这种直接具体的情形中体现出来的,为满足特定需求的社会行为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形态,不仅阶级的斗争丰富多彩,公开的、隐蔽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等等;而且又由于各阶级互相依赖而共处,特定时期他们也致力于合作、交往、社会秩序、安定的生产生活,致力于社会肌体的正常运转。这就是辛亥革命这场资产阶级革命却受到其社会基础的对立、江浙资产阶级要袁世凯而不要孙中山的原因;这就是当年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时资产阶级以狭小的私人利益而牺牲全阶级的政治利益、欢迎自己统治地位的毁灭,而无产阶级有时也为暂时的安逸而忘记自己阶级的革命利益的原因,这就是小农与封建专制政府既对立又一致的原因;也就是当今日本工人以企业为家、关心企业生产、把资本家的公司的成就视为自己的光荣的原因;是落后的俄国首先爆发了无产阶级革命,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着同样阶级根本利益的无产阶级至今没有革命的预兆,注意于经济改良和眼前经济利益甚至趋向于保守的原因。这种极其复杂的要求的行为是不是无法掌握呢?也不是。这种复杂性既然根源于作为生物的人的需求的复杂性和作用于这种复杂性的社会条件的复杂性,我们可不可以从主体与客体的结合中寻找出一种本质的、带规律性的东西呢?

为此，我想用生存体系这一概念。所谓生存体系，就是特定民族、特定地区、特定时期人们生产生活各要素互相配合、有机联系构成的任何一个独立发展的民族都有的自成体系的生存方式的结构，是人与以生产力水平为标志的社会存在结合的具体形态，一方面反映人的特定需求，一方面反映满足或制约这需求的特定社会存在。具体讲就是以满足特定人群生存发展需要的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为基础，有社会组织结构、社会心理结构（指对当代人的需求有影响的社会心理积淀及其结构模式）、政治权力结构等。它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涵：

第一，无论是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在具体作用于各阶级时都有其具体形态。在各时期特别是在各民族各地区，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具体形态五颜六色，决不是同一个模式，没有抽象的生产力，更没有抽象的生产关系。如：原始生产力可以有采摘、狩猎、收获、捕鱼等多种具体形态；奴隶制下可以有罗马的商品经济发达的生产力，也可以有游牧的，还有农耕的等；封建的生产力有庄园自给自足的，有小农个体独立生产的，等等；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具体形态才渐趋一致，但也还是有差异。本文所讲的直接满足特定人群生存发展需求的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就是指生产力及由它决定又作用于它的消费方式在各民族各地区的具体形态。

第二，我之所以强调结构，就是因为生存体系的作用不是单因单果的线型作用，满足着规定着人们生存发展特定需求的客观因素是有机多面体存在，象人的五官一样不可分割，其作用乃是各因素的整体效应，多维立体地作用于各阶级，不存在机械性的相互作用、谁决定谁的问题。比如，任何生产都脱离不开社会组织结构和政治权力结构，农村中的互助和社会关系网及官府的控制功能对小农的生产生活都有着巨大的作用。再如，生产力的主要因素是人，而人又离不开社会心理积淀的作用，人又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又以生产关系为基本。可见，各要素不是彼此分开的“元”，而是以一定的结构共处于一个立体中的“维”。

第三，它是特定人群生存发展的直接条件，直接明确地规定了各阶级生存发展的特定需要，各阶级直接依此为生，在这样的生产、这样的生活中产生具体利益要求，其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家庭关系和家庭活动等都在这体系中，受其规定，阶级的利益由此具体化，阶级的社会行为特点由此固定化。北极的爱斯基摩人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为猎取动物而忙碌，以此作为主食和燃料，以此为基础的生存体系决定了他们特殊的生存和发展方式，在这样的生产生活中产生了他们利益要求的具体形态，迟迟未出现阶级分化等社会面貌和社会发展状况也可以由此得到更具体的说明。世界各地各种以游牧或采摘、狩猎为生的人们在阶级分化等社会发展方面的具体状况无不由其生存体系决定。在阶级社会里，不同地区的奴隶主阶级、奴隶阶级、地主阶级、农民阶级，对各地区、民族的社会面貌及社会发展的作用是不同的，这一切无不出于特定的生存体系，特定生存体系规定了他们的利益要求和社会行为，导引他们以不同的速度向不同方向将自己所在的社会向前推进。希腊罗马奴隶主亟亟于海外扩张和海外贸易，而中国的奴隶主却无此奢望；到封建社会，西欧庄园中的领主与中国由小农发展起来的地主的利益要求有天壤之别，西欧城市中的商人手工业者与中国商人手工业者、西欧农民与中国农民在利益要求和社会行为社会作用上更是相差绝远。由此可见，生存体系对民族的特定标志作用同样给民族内的各阶级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工业化的生存体系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生产关系不同的社会中的各阶级，在思想、社会行

为等方面有了趋同的趋势，生产生活的要求有许多相似之处；而同样生产关系的情况下，又可能因生存体系的某几“维”有差异而出现差异。

三

具体到近现代中国，我们过去的阶级分析方法，着重于分清革命阶级与反动阶级，革命的依靠力量、团结争取的力量和打击对象。这在革命时期为扫除社会前进的障碍是非常必要的。在搞现代化建设时期则需要更全面系统地认识中国社会各阶级并由此重新认识中国今天的现实社会和国情。

近代中国以土地为经济、文化、家庭结构的基础，社会如政治制度亦由此产生，分工简单与生产主要为自己消费，这是近代中华民族生存体系的基础。这里包含着以农为本的民族的特性，也有着由生产力各要素互相配搭的特定方式（家庭、家族中的劳动者与特定的生产工具、一定质和量的土地结合而成的一家一户小生产，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简单小生产农林牧副综合经营，又有着区域性的简单交换）构成的生产结构及与它交融在一起互相配合的生活消费结构、社会组织结构（以家庭、家族、村落、同乡等因个体小农生活需要而产生的社会关系网络最为突出）、政治权力结构（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治、村落中农民与政治隔离较远、官绅一体等）以及内在的社会心理结构等一整套中华民族自成体系的生存方式，以结构形式互相配合而存在着的多维立体，既反映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发展水平，又体现着它们在中华民族的具体形态，诸因素交织作用于各阶级，对生存于其中的中国人的特定要求、各阶级的具体利益要求和社会行为特点都有直接的明确的规定作用，各阶级由于生产关系中的不同地位而形成的矛盾斗争和依赖共存，都受着这一结构的规定，其一切利益要求和社会行动无不深深地打上中华民族特定生存体系的烙印。只有清楚地认识生存体系与各阶级的关系，把对阶级利益的考察深入到直接规定了各阶级具体利益要求的生存体系中，从而看到各阶级在这样的生产生活中如何产生具体利益要求进而采取社会行为作用于社会的，才能深刻了解这是中国社会的某个阶级，而不是仅从一般生产关系理论上的地位和利益出发的一般性的某个阶级，并由此出发科学地认清由这些中国的阶级的行动造成的近代中国社会。

研究中国的地主阶级，不研究地主制经济与小农经济不可分割的联系，不研究中国土地占有的流动性，不研究租佃制符合我国国情的客观存在条件，不研究社会组织结构、社会心理结构对农民与地主关系的全面影响，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认识中国的地主阶级。打倒他们容易，可达到打倒他们的目的——即通过打倒他们促进中国社会进步——却离不开这些更深一层的研究。中国农村各阶级都倚之为生的生存体系不仅影响着规定着地主阶级的社会行为，同时对农民的影响也是极其深刻的，作为主要革命力量的农民阶级不会因打倒了地主阶级而立即改变了自己的精神面貌和行为方式，恰恰相反，行政手段稍一放松就会出现新的地主。“合理的”小农经营方式这一旧有生存体系的基础仍顽强地起着作用，它是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一致而自然产生的，在简陋的生产工具、肥力不充分的土地及相对过剩的人口条件下为维持生产力和社会存在所必需，是在这种其它各方面都不具备的条件下推动生产者这一唯一触动的因素发挥积极性的原动力，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坚固的社会经济基础，这不是政权或生产关系的变革所能改变的。直到解放后，农业集体生产的长期不振和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的迅速成功仍说明着这个问题。农村社会各阶级无疑都受它的规定，不能脱离它的特定规定性去考察农村社会各阶级及其发展变迁。

中国地主和农民的具体利益要求和社会行为都受着固有社会组织结构的规定。村落共同体、社会上的关系网以及一些人为的社会组织这一套农村社会历史形成的组织结构，由于是适应小农经济下人们生产分散、力量单薄而生活中的需要又是多方面和长期的这种特定生存需求而产生，形成了对人们利益要求和社会行为的这样一种具体规定：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依赖是多方面和长期的，整个组织结构内部个人之间不一定有直接利益关系，但间接利益却大得到足以影响生存。所以人们都非常注意人情、关系，搞得一切虚的实的利益、精神物质的需求都可得到，反之则受冷落，遭鄙视，自己内心受折磨，生活中难免遇到的困难也很难得到帮助。对于势单力孤的小农，甚至一些有钱势的地主，这压力是无形而又巨大的，当然因阶级地位不同感受程度不一样，但谁也逃脱不了这张社会关系的大网。近代中国农村社会的面貌和发展与此大有关系。

中国的资产阶级虽然是新生产力的产物，其保守性之所以那么大，对封建势力的压迫之所以那么容易顺从，从本质上讲原因也在于旧有生存体系的规定作用。他们虽然使用了机器生产，但仍是传统中国社会整个经济体系的补充，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社会关系上，他们的生存都与传统社会、经济体系密不可分，他们是传统经济、社会体系的既得利益者而不是对立破坏者，对旧经济社会体系的瓦解是一种不自觉的、自然的过程，没有显著的、截然的对立，从本质上讲并没超越过去的商人，所以他们的利益要求与过去商人、手工工场主是一脉相承的：一方面对封建官府的苛捐杂税、封建官府的腐朽统治强烈反感，因而反对官府、欲“叛上”。但仅此而已。另一方面，他们并不反对整个传统社会体系，而是尽量使自己适应它，力争在这体系内部求得比破坏这体系得益更多的生存条件。事实也是这样，大资本家、经营较顺利的资本家一般是旧体系中的有力者。他们不仅没有形成独立的社会心理体系，在社会组织上也是借用传统社会关系网（同乡、同学，等等，可以包括上到中央执政者、下到工人仆役的整个立体社会面），辛亥革命后连君主立宪也不提了，政治上在独裁统治下、在封建势力的重重压迫下仍然陶醉于眼前的利润之中。所以，辛亥革命时期尽管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物质前提，从绝对数量来说已经超过他们17世纪以至18世纪的欧美前辈，但却难以取得英法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辉煌成就，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在各方面都与跟封建势力处于敌对状态的西欧城市共和国中的资产阶级显著不同，生产结构乃至整个生存体系上融为一体，力量结构上也就不成对立。由此也很容易理解资产阶级为什么那么容易被“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主宰，为什么不可能作为一种社会制衡力量抑制专制独裁，为什么不会强有力地瓦解旧社会。

按过去把阶级从国有生存体系中分离出来的阶级分析方法认识社会，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三大阶级——“三座大山”推翻了，无产阶级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中国社会的一切都应该翻天覆地的了。而实际是：这只是政权的获得，革命成功只完成了革命的任务，必须以长期的建设实践来根除的一系列障碍依然存在，中国社会固有生存体系的许多基本因素仍很坚固地作用于社会各阶级（包括无产阶级），成为我们建设现代化事业不能不认真认识、认真对待的客观实际，制约或推动着向现代化迈进的步伐。不对整个生存体系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就容易凭一股热情，错误地以为三座大山推翻了，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只要不断通过阶级斗争保持住政权，就可以很快富强起来。可是在实践过程中我们遇到了那么多的困难，经历了那么多的挫折，根本原因就在于历史悠久、根深蒂固、完整系统的生存体系还在对我们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发生着制约作用。不从整体角度协调全面地发展，只能发现一系列的不协调，各种牵制力量会把“四个现代化”的一切基础设施抽空

缠死，社会是个有机的整体，不讲社会整体的现代化、不重视生存体系的运动规律，哪方面的现代化也建不成。

为彻底认识中国社会，为从根本上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稳步实现现代化，我们必须全面系统地剖析我们中国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特定生存体系，认清其特殊发展规律，把各阶级放回这个体系中，认清各阶级、各社会集团的实际利益要求、社会行为特点和实际社会作用，以此在社会主体——人与社会客体的统一中取得对中国社会的系统全面的理论认识，为社会改造提供一个系统全面的方案，以减少盲目性和片面性。

1986年11月

作者工作单位：山东省社科院社会学所

责任编辑：王 颖

《社会学方法简论》出版

本世纪以来，学术界对科学方法本身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社会学研究方法对于社会学的发展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因而社会学研究者不能不注意方法本身的研究。目前国内已有若干种这方面的译著和介绍，但出于自己的理解和研究而写的著作还不多见，北京社会科学院李冬民所著《社会学方法简论》是一本按自己的理解和研究写成的理论成果。它的对象是：具有高中语文和数学程度的自学者，社会学研究者，有关院校师生，社会学函大学员，企事业管理干部，社会工作者。

书中着重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一般程序及其与实证主义方法的区别。对经验实证方法、理论逻辑方法，及社会学的现代研究法，如观察法，抽样调查方法，社会统计法，系统论的方法、模式、原则、程序等，作了理论的概述。

本书的后半部分介绍了应用社会学研究中经常使用的社会调查方法，抽样调查方法、问卷设计知识，资料整理和统计分析方法等。另外还附有解说性和描述性的图表数十幅。

本书已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子 选)